



布老虎丛书
随笔系列



耳朵的立场

ERDUO DE LICHANG

周泽雄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布老虎丛书
随笔系列

耳朵的立场

周泽雄/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耳朵的立场/周泽雄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 9

ISBN 7-5313-2370-2

I. 耳… II. 周… III. 随笔—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0190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56 千字 印张: 7 插页: 2

印数: 1—8 000 册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370-2/I·2073

定价: 13.00 元

自序

一九八九年以前，我学着写诗，一写就是十年，不过一首诗也发表不了。一九八九年以后，我学着下围棋，水平糟不可言，却乐此不疲。这不怪我愚蠢，只能怪围棋太有魅力了。一九九二年冬日某天，老同学张远山来访，他刚买了一台 286 电脑，正卓有成效地开始其严肃的规模化写作生涯。他劝我不要再玩物了，可以写点文章。内人也与他一唱一和，并允诺，只要我进行写作，她可以稍微多承担一些家务活。我身上某种蛰伏已久的东西被触动了，我便对自己说，嗨，伙计，可以开始了。于是，我断断续续、懒懒洋洋地开始了写作。

这样漫不经心地写了七年，直到有一天，我又突然来劲了，觉得白天在单位里上班不是个好主意，要写作就得像踢足球或炒股票那样，走职业化道路。于是，经过一番短暂的礼节性犹豫，我辞职了，或者说转岗了，从此每天都会花些时间坐在电脑前，开始所谓“SOHO”族生活。前七年我写了总共不到十五万

字，职业化后第一年，我写了二十五万字。第二年，我仍然写了这么多。第三年（也就是今年）估计还是这样。现在看来，一条匀速运动着的直线，有可能一直把我拽到末日。

忘了这句话是哪位俄国作家说的，反正我永远记住了：“大作家的生活是单调的，只有小作家才丰富多彩。”那么，为了争取成为大作家——这话应该不像乍听上去那么狂妄——我得先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单调些再说。

还有一句话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党。”我也懒得计较孔子这话是否隐藏着别种“春秋大义”，我只简单地把它理解成这样一条原则：不参加任何组织、协会或小组。我坚信，作家自由的基本前提是：无条件地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别的人生格言我就不十分需要了，暂时我就靠这两句话撑持着。好在我撑持得还算轻松，还不需要涨红脸。

虽然我坚信“读者是上帝”，自诩也不缺乏为读者服务的热情，但是，对于自己能否保证提供好的文字产品，我却没什么把握。

这问题对我虽然沉重，却没法量化，太虚，没有一个像俯卧撑次数那样清晰可靠的检验标准，我不知道怎样才算做到了，怎样才算失败，我无法诚实地为自己的回答负起责任来。不管如何回答，好像都有说大话或掉虚文之嫌。我既然在键盘上捣鼓，当然希望写出的文字受到欢迎，但这与拍胸脯担保可不相干。

正如打牌时不要过多考虑工作，写作的当儿，最好也别过多地给自己打气，除非命笔之前身心恰巧处于胚胎状态。如果真这样，最好的对策也该是放弃涂鸦，“须要退步抽身早”，而不是背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口号。

我的体会是，写作固有其独特之累，但这份累属于创造之累，它孤独，但不寻求援军；它无奈，但可能是一种诗意的彷徨；它痛苦，但不惜以“金不换”的傲慢蔑视世上绝大多数幸福。写作未必比登山更艰辛，它不会有生命之虞，即使有，死于登山是一种惨剧，死在书桌前则是一种浪漫，但却比登山更不可确定。登山毕竟有个可供鉴定的标准，不有个顶峰在那儿等着吗？写作则没有这样一座顶峰。咬紧牙关对马拉松选手有点用处，对写作则属多此一举；情绪亢奋对百米赛跑很有帮助，对命笔则属多余。这方面写作之道也许宁愿与弈道相通：自信心太强，说不定反铸成败因。过分的自信难说不会干扰写作的从容，妨碍运思的深入。何况，困惑较之坚定，常常还更能支撑作家的冲动。比如，随着故事的进行，原赖作家想象力存活的纸质人物，竟从文字里摄取了精魂，结果反而挣脱作家的主观意愿，自行其是起来。作家被自己的创造物弄得不知所措的例子，可说比比皆是。学者也不例外，分析心理学家古斯塔夫·荣格就是一个例子。荣格不仅写作之初经常充满困惑，写作终了，他往往还产生更大的困惑，以至书的末章不是得出重要的结论，而是抛出了更大的问号。

这也是我认可的写作之道。我以为，写作本质上是对未知领域的探险，该过程的不可预知性，不比横穿罗布泊沙漠来得少。事实上作家正是在不知道下一步会写些什么的时候，正是在对象还没有被十分看真切的时候，他的写作才更具勘探价值，其成果才更可信一些。他不那么胸有成竹，却反而能促使思维神经处于激活状态，最大程度地确保对象得到高度尊崇，确保写作本身不受功利原则的羁绊。

写作对于我首先是一种兴趣，一种活法。为什么偏偏选择这种活法（众所周知，在现今的世道，它至少是不值得推荐的），我可说不上来。对我来说，写作本身充满了意义和价值。至于拙作是否也能因此攀附上些微“意义和价值”，便不是我多嘴的领域了。

写作时我喋喋不休，写完后我就闭嘴，然后要么陪老婆逛街，要么找朋友聊天，要么就打开电视机，挨个频道地搜索球赛。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拿本书在手上。

此刻我也妄想着把拙著送到您的手上，妄想着请您赐教。

就算是序罢。

周泽雄

2001年6月14日于上海西郊

目 录

自序

社 会 篇

我们高贵吗.....	3
牢骚的社会学.....	9
在“自信”的背后	14
走出“教育循环”	22
人性的反贪局	29
崇拜、妖人和围棋	37
真理不是骰子	45
虚幻的意义	51
从钱锺书考零分说起	55
民族文化的走向	59
批钱须知	66
人怕出名	74

私人篇

记忆中的大名	79
现代死亡	89
耳朵的立场	101
老歌	107
人值残春	110
我的女儿在天上	113
深情与真气	117
两种时间	120
冬日的枕头	122
车厢里的倾诉	126
甬直、朱家角和我	129
塞南古—余秋雨—同里镇	135

综艺篇

好莱坞的正义	149
谁在仰望天空	152
被俄罗斯艺术烫伤	155
两大文明的缘分	158
文人这一行	161
文学与忠告	164
古老的职业	167
文坛排行榜	171
文学的疲乏	174
五笔输入法的神秘内核	176

顾准与梵高	179
城市人与广告	182
流行的现代人	185
浪漫世界的关闭	189
千年西塘	192
龙游石窟	200
中国球迷阶级分析	209
球星众生相	218
足球与性爱	228

社 会 篇

我们高贵吗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纯朴善良，具有无数让人心醉的品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她还具有众多百里挑一的特征，比如她无疑就是最为源远流长的民族。我们知道今天的埃及人与古埃及已判若两族，印度人去《梨俱吠陀》精神也相距甚远，巴格达除了保留有大量两河文明遗址外，我们已不可能在伊拉克人脸上看出苏美尔人的真实表情……惟独中华文明其源不匮，绵延不绝，直到今天都依旧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也在世界的这边和那边——挥洒自己融古老、清新于一体的东方人文气息，且不说她还占据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但是，不管我如何热爱自己的民族，我似乎仍然无法将“高贵”一词赋予她。撇开对个体的考察，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而不高贵的民族。正如“恨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爱的对立面”（罗洛·梅语）一样，高贵的反面也不一定非得是卑贱不可，而毋宁只是世俗。这的确是一个充满世俗热情的民族，家长里短成为无数个体生命事件的核心，至于举止高雅与否，通常倒并不介意，即使她曾被满世界称

颂为“礼仪之邦”。我个人认为，就像阿Q先生不该老嘀咕“老子先前也阔过”一样，我们最好少说乃至不说“礼仪之邦”四字，若阁下实在憋不住喷涌的爱国热情，赞美之前也请先去一趟公共厕所，视乎鼻子的感受胸腔的观感，再做定夺。

一个民族是否高贵了才能伟大？答案是否定的，中华民族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高贵是不是伟大的敌人，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不少兄弟民族也已给出了证明，显示高贵与伟大具有极佳的兼容性。经常出国的人多半有此体会：该国的公共厕所甚至比我们家里的客厅还要高雅，气味还要芬芳，但我们怎么也不该说人家这种行为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得承认，我这里强调的高贵，与任何哲学本体论无涉，也与所谓贵族身份无甚瓜葛。不，庶民的高贵，通常并不以此君是否急公好义为标准，也不盲目怂恿人们将用以装修新居的钱悉数捐给“希望工程”，如果有可能危及生命，那就更不鼓励人们贸然舍生取义。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是个别人中龙凤的境界，对普通人根本构不成鞭策作用，抬举过甚，则要么生成对普通人的性格压抑，要么反而引诱芸芸俗物故作姿态，存心学假做秀。说句实话，对这类过于堂皇的格言，我是非常头疼的。我这里说的高贵远没有那么高蹈玄远，它始终不脱世俗领域，只不过旨在使世俗生活去除一点世故，增加一点坦诚；去除一点咋呼，增加几许宁静；去除一点奸诈，增加若干诚实……此种高贵系由一系列最为自然的日常行为组成，本质上并不能由任何一种语录加以规范。条规的作用是：用之惩戒则彰，用以鼓励则微，此乃社会道德

家的通识。如果我在公共汽车上主动为孕妇让座乃是迫于压力,那么我很可能在列车上就不这么做了,因为列车上通常并不会设置“老弱病残孕专座”,走道上站满乘客的场合倒为数不少。何况,用条例鼓励好的行为,永远是挂一漏万的,难道这意味着框框外的所有行为都得到允许?此外,似乎也没有一个政府好意思制定这样的法律:女士不可穿睡衣上街,或严禁男人走出厕所后整理前门襟拉链。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人家不制定这一条乃是因为无人违犯,我们不制定这一条,则仅仅是为了避免神圣的法律流于琐碎和婆婆妈妈。

高贵教育的不被认可,或虽认可但定位有误,实是我们国民基础教育的重大失误。

回想自己幼时受到的“素质”教育,大抵属君子“大节”范畴。我们的课本里充满了如何临危不惧,见义勇为,乃至从容就义的感人事迹(刘姓中就有刘胡兰、刘文学、刘英俊等一干英雄),或如何发扬“钉子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标准除了都很棒外,还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需仰视才能得见。因为这些在书本里大加提倡的人格标准,我们事实上一辈子都用不上一回。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在其一生中都会逮着见义勇为乃至从容就义的机会,我们的国家不也过于黑暗了吗?国家真这么黑暗,我便不知道为它而死还有什么“就义”可言。且说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如此高亢入云兼人云亦云地教诲一番后,转而又让我们把书本翻到封底,我们便温习起印在上面的若干行为准则来。我小学课本背后印着的是“三要三不要”,内容不出“饭前便后要洗手”之类。孤立地看,人生大节与“三要三不要”都很重要,两

相对照，便顿觉滑稽：我们要么被拎起衣袖，精神境界眼看就要一股脑儿地升华到不知其几千万里的云端，要么又忽遭冷眼，仿佛一转身就会成为随地吐痰的小浑蛋。我们知道能在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未必对付得了乡间草丛里的一条小青蛇（这需要两种不同的胆量，称为“阳胆”“阴胆”如何？），头脑里尽想着如何仿效吉鸿昌从容就义的孩子，仍可能当着客人的面抠鼻子。“别当着客人的面抠鼻孔”，这样的教导，恰恰是我们基础教育的盲点所在。

我们来看看喝汤该不该出声吧。我当然属于出声派，而且我也同意林语堂前辈的观点，出声地喝汤，更能接近汤中真味。但我这么说，其实也是习惯成自然，因为除了在个别需要假正经一番的场合，我从来没想过喝汤应该噤声，所以我不假思索地认定：要人喝汤不发声音乃是一种人性的压抑。你试着重复一下成语“津津有味”看，其中“津津”二字，极具拟声意味，赋予饮食一种美妙的声学效应。不过我又立刻想到，一个西方人，如果自幼即被告知喝汤出声是不礼貌的，换言之他从小就已养成不出声喝汤的习惯，则这层压抑并不存在（正如不能随地大小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带来压抑，即使他正满世界找着厕所），相反，倒是一定要他出声地喝，他会觉得汤味索然起来。可见，如果不出声地喝并不会妨碍对汤味的欣赏，也无助于提高他人的胃口（这是出声派经常提到的一个理由），那么，它确实要高雅一些，因为，你凭什么断定别人听到你的“津津”声会更高兴呢？唉，这问题没法继续，在中国，一个妻子见到丈夫或母亲见到儿子喝自己做的汤时大发声响，她确实会更加兴高采烈。在这个意义上，喝汤出声简直就是一种高尚的礼节，一

种可以愉悦他人、滋润人际关系的美妙音乐。

如果我坚持要谈论喝汤该不该出声音，看来我得重新设计问题的方向：即中国人是如何形成对“汤声”的审美能力的。我不坚持了，我们谈点别的吧。

上海《新民晚报》上有一条坚持多年的小栏目：本周不雅观穿戴提示。我沮丧地发现，在这个有限的选题内，居然会生成那么多新鲜生动的内容，从而使该栏目的生命力获得强有力的支撑：每次它都能毫不勉强地指出国人的某项不雅观行为，每次指出都在坚定本文的核心论点：中国人，你实在不够高贵。

在我们基础教育视“高贵”为无物时，寻常的人际关系只有依赖一套自给自足的民间系统来维持，我指的是“面子”系统。不识高贵为何物的中国人，却视“面子”为生命；视“面子”为生命的结果，反而使我们更加远离了高贵。我这就解释原因：面子是一套他律系统，它不以个体感受为指归，只整天留神提防着别让他人（通常为邻居和同事）看笑话；高贵则是一套自律系统，它首先关注的乃是自我的评价认知，相对于他人的闲言碎语，它更留心别被自己瞧不起。就效果而言，这两套系统的区别在于：做事始终以问心无愧为标准，一般也就自然地使闲话无从滋生；行事仅视乎他人脸色，则背着人干些阴损不雅的行为，逻辑上也是不可避免的。高贵不是外在的律令，实在乃是内在的律令。我不想反对“五讲四美”，何况我没有任何反对它的理由，我只不过想限定一下它的适用范围和疗效而已。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中依旧要么只有见义勇为的英雄，要么只有“饭前便要洗手”的规劝，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让孩子领悟到